

现代社会学文库 第二辑

李培林 ◎ 主编



China
Society

中国社会

李培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 / 李培林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现代社会学文库; 第2辑)
ISBN 978 - 7 - 5097 - 2083 - 7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4076 号



郑州大学 *04010751892. *

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 中国社会

主 编 / 李培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郑 燕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郭红生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02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083 - 7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

出版说明

199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筹划出版了《现代社会学文库》，希冀汇总中国社会学优秀作品，引介国外社会学优秀成果，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十多年过去了，这套文库粗具规模，在社会学界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逐渐走向成熟，学术从业者的训练也逐步专门化，并有大批海外学子学成归来。在此，有必要在社会学面对中国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在学术从业者构成以及知识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重新组织一套社会学研究丛书，以推动中国社会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十年来在社会学图书的出版方面着力甚多，陆续出版了多套社会学丛书，比如《清华社会学讲义》、《社会学教材教参方法系列》、《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民族与社会丛书》等，并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基地。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的取向将是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普遍推广的社会学讲义。这类讲义必有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鲜活的中国经验，必有对过往经验的反思以及基于实践的创新。二是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和理论专著。学者基于扎实的调查而形成的著作是重点。此类著作当有深刻的理论思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范本。

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产生了丰富的中国经验。社会学学者当能生产出更加丰富的知识，才能无愧于这个我们身处其中的伟大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愿以微薄的力量参与其中。愿此套文库的出版能够对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作一份贡献，也愿与社会学界的朋友一道，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新成长阶段的更大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中于北京华龙大厦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 /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1
一 传统社会的稳定性	1
二 传统社会的封闭性	3
三 传统社会的刚性	3
四 传统社会的整合性	5
五 传统社会的二元一体性	6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	7
一 鸦片战争：第一个转折点	7
二 辛亥革命：第二个转折点	8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个转折点	8
四 改革开放：第四个转折点	9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	10
一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10
二 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11
三 区域发展结构的变化	11
四 所有制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12
五 组织结构的变化	13
第四节 改革和发展的“中国经验”	14
一 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假说	14
二 改革实践不是遵循既定的理性模式	17
三 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利益整合的结果	20

第五节 中国经验的基本要点	22
一 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	22
二 渐进式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	22
三 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积极的民主化探索	23
四 快速增长中的非平衡发展	24
五 注重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25
六 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	25
七 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	26
八 注重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	27
九 坚持对外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	27
十 努力克服环境、资源与快速发展的矛盾	28

第二章 家庭与婚姻 杨善华 / 33

第一节 中国当代城乡家庭制度变迁的背景	33
一 行政等级金字塔与社会发展的梯级模式	33
二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34
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乡社会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36
第二节 城乡家庭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机制	38
一 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	38
二 农村家庭制度的变迁	39
三 社会变迁对城乡家庭的影响	40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中的婚姻	43
一 婚姻文化模式：从家族婚到自主婚	43
二 现阶段城乡婚姻的特征	48
第四节 家庭制度变迁与社区情理	52
一 影响城乡家庭制度变迁的因素	52
二 家庭制度变迁的目标	55
三 关于社区情理	56

第三章 宗族与家族 张小军 / 60

第一节 家族与宗族概说	60
-------------------	----

一 家族与宗族界定	60
二 家族与宗族之辨	61
第二节 宗族、家族的形态	63
一 宗族的早期历史形态	64
二 宗族的文化创造	67
三 宗族模式：水波差序对驻波差序	69
第三节 国家、土地与革命	72
一 宗族的国家模式：边陲说与中心说	72
二 宗族与土地	74
三 宗族与革命	76
结论 理解宗族的五点中国经验	78
 第四章 民族与民族关系	郝时远 / 86
第一节 从“五方之民”到中华民族	87
一 《礼记》与“五方之民”的概念	88
二 秦汉以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89
三 最后帝国——清王朝建构的民族国家	91
四 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	94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平等	96
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由来	96
二 作为自治基础的民族识别	97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	99
第三节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区域发展	101
一 西部大开发战略	102
二 民族区域发展不平衡	103
三 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	107
 第五章 社会心态与当代变迁	周晓虹 / 110
一 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态及其近代嬗变	111
二 解放：旧传统的崩溃与“新传统”的固化	116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119
四 边缘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122

五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	126
第六章	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	蔡 昉 / 132
第一节	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	132
一	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	133
二	计划生育政策	134
三	人口转变的成效	136
第二节	人口红利、增长源泉和增长绩效	138
一	增长源泉与人口红利	138
二	劳动力供给效应和储蓄效应	140
第三节	人口转变与增长可持续性	142
一	“未富先老”导致劳动力短缺	142
二	增长源泉及可持续性	145
第四节	人口转变与社会建设	149
一	养老保障制度	149
二	出生人口性别比	150
三	生育政策	151
第七章	政治体系与中国改革	杨大力 / 156
第一节	中国个人权力地位获得的制度环境及其演进	156
一	改革前个人权力地位获得的制度环境	157
二	改革后个人权力地位获得的制度环境及其演进	163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政治体系及其发展	168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体系及其发展	168
二	社会结构转型与政治体系	171
第八章	城市化与城乡关系	蔡 禾 / 179
第一节	城市化的历程	179
一	城市化过程与阶段	179
二	中国城市化的地域特征	183
三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化	185
四	大城市圈的形成	186

第二节 城市化的特征	187
一 行政主导：从资源垄断到政策引导	187
二 发展路径：从单向到双向	189
三 城市社会的变化	193
第三节 城乡关系	195
一 城乡分治	195
二 城乡不平等	197
三 走向协调发展的城乡关系	199
 第九章 社会分层与制度变迁	李 强 / 205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205
一 传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征	205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	209
第二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215
一 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新职业体系的形成	215
二 体力劳动工人队伍的变化	216
三 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兴起	217
四 身份制的变迁	218
五 单位制的变迁	220
第三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222
一 阶级结构定型化	222
二 中间阶层的发展趋势	224
三 阶层利益的多元化	226
 第十章 农民工与社会流动	李春玲 / 232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城乡移民运动	232
一 城市化战略与城乡移民	233
二 民工潮与农民工现象	235
第二节 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238
一 劳动力流动与移民	238
二 社会隔绝与农民工的市民化障碍	241
三 农民工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	244

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	247
一 经济改革之前的社会流动	248
二 社会流动模式的转变	251
三 开放性与社会流动率	253
 第十一章 反贫困和社会政策	关信平 / 257
第一节 当代贫困问题及中国贫困的特点	257
一 当代社会中贫困现象的普遍性	257
二 贫困概念的定义和测量	258
三 中国的贫困的类型和模式	260
第二节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反贫困行动	261
一 中国农村贫困的状况和特点	261
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行动	264
三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268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及反贫困行动	270
一 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基本情况	270
二 当前中国城市反贫困体系概况	272
三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未来走向分析	276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由于她的东方文化、表意文字和长期的不发达状况，对于发达的西方来说，长期以来她是一个遥远的、东方的和神秘的国度。但是，被拿破仑称为“睡狮”的中国，在近几十年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睡狮”似乎真的醒来了，而且震动了世界。人们在重新思考，这对于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经验？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传统社会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学中，它是指原始社会之后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与此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指从秦以降到辛亥革命持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这个社会虽然从制度上被埋葬了，但它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却积淀在中国的文化中，从深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定着中国人的行为。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点，即稳定性、封闭性、刚性、整合性和二元一体性。

一 传统社会的稳定性

中国由秦以降的两千多年，一直滞留在封建社会阶段，它几乎占去中

国有信史可考的传统文化史的全部。在此阶段，历史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和同一社会制度的“再生产”。虽然政治上已从贵族统治转变为高度集中的官僚专制统治，经济上已从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landlord economy）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landowner economy），但本质未变。虽然有频繁的战乱和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传统中国却始终维持为一个再生力极强的专制帝国。这种结构稳定性在社会学理论中是相对于结构变迁而言的，它与物理学或经济学中相对于“非平衡”的“平衡”概念含义不同——在不平衡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也可能是高度稳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结构稳定和社会稳定也有一定区别，在稳定的社会中，仍然蕴含着结构振荡和结构冲突；而在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转型过程中，也仍然可以有社会稳定。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高度稳定性，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由历史发展的自然循环定律决定的。朝代更替和治乱相循都是根据“天人合一”原则建立的社会原型的周期表现，这同演义小说家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实在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有思想似乎深刻一些的哲学家把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缺乏“时间”和“历史”的“观念”，如黑格尔称中国为“空间的国家”。还有一些人提出技术的和自然的理由，如缺乏引起结构变迁的技术发明，缺乏便于结构开放的对外贸易海岸线，等等。较为新近的提法，是援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认为这种高度稳定性（超稳定性）是由于封闭系统中靠近平衡态的“动乱周期振荡”起到调节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高度稳定性应当从经济基础中寻找根源。马克思曾依据有关东方社会的文献，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钥匙。他说：“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1975/1867：397）从历史上看，单纯的游牧经济结构是极不稳定的，古代单纯依靠游牧经济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伊斯兰帝国都很快就瓦解了；欧洲特别是古希腊罗马的牧农混合经济是一种亚稳定经济结构，它比游牧经济具有更强的适应和维持能力，同时又有较多变异和选择的可能性；而中国自给自足的单一小农经济则是一种高度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帝国依旧，从根

本上说是具有这种高度稳定的经济结构作为基础。

二 传统社会的封闭性

社会结构可以分成封闭结构和开放结构。封闭结构由于缺乏新要素导入，所以自身的模式维持能力和惰性极强；而开放结构由于处在经常性的物质交换和信息流通中，结构分化和产生新结构的可能性（不是必然性）极大。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当然和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中国西面有高山阻隔；东南面虽面临大海，但在航海工具极不发达的时候，大海无疑也是天然屏障；而北面在秦朝就修筑了万里长城，在抵御游牧民族侵略的同时，这也切断了牧农结合的通道。但是，自然地理原因并不能说明一切，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有其更深刻的经济原因。

中国由于多山少地（山地占 2/3，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占 40%），很早就感到耕地不足的威胁，从而开始毁林开荒和向精耕细作发展，加之人口增长和维持霸业所需的庞大常备军，粮食变得异常重要。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是有其功能上的要求的。朱元璋把“广积粮”当成称王之本，也自有他的道理。历代帝王重视兴修水利和屯田，都与粮食需求有关。而粮食的极大需求是促成封闭的单一小农经济的重要原因：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把社会经济单位划分成最小的家庭，把土地分割成无数碎块，造成一个个封闭的、自我变革能力极差的自给自足生产系统；其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都很低，但由于自给自足状态得以勉强维持和交通与贸易的地形限制，社会对外来经济的需求和对外贸易的机会都极少，从而强化了单一农业的封闭体系。在西方，从公元前 6 世纪希腊人开始的商业殖民，到中世纪的十字军远征和近代的英西战争，实质上都是商业战争，是为了争夺陆地和海上贸易交通线的控制权。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次战争，目的都是为了夺取土地和扩展疆域，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即使秦始皇授意的海上东渡寻仙和明朝郑和的七下西洋，也都不是出于商业目的的经济行为。

当然，经济和自然地理并非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唯一维度，下面我们就从其他方面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作进一步的考察。

三 传统社会的刚性

社会结构的刚性特征是相对于弹性特征而言的，所谓刚性结构，是指

社会结构的应变性和可塑性较差。它有三个规定性：其一，结构内部不易萌生和生长新要素；其二，结构倾向于抗拒和抵制外来的新事物；其三，即使在外力的作用下，结构也不易改变以适应新环境，它要么维持原型，要么解体。可见结构刚性的特点是同高度稳定性及封闭性的特点紧密相连的。

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其自身发展中曾有两次新要素的萌生和改变结构的机遇，但都被高度集中的官僚专制统治扼杀和阻碍了。第一次机遇是商业的萌生。由于中国各地经济的差异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在农业经济较发展的地区，有一部分农业剩余产品可用于交换并进而转化为商品，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拓展市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这种转化的媒介在中国主要是赋税和地租，所以商业和官吏、地权结成一体，加之官本位体制和抑商政策的限制，步入仕途或买官位成为社会升迁的唯一途径，这样本来可以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多半转化为官场贿赂和购置地产的资金，交通、市场、税制、货币等商业手段也都首先成为政治统治手段，这阻断了小农经济走向农商结构的通道。第二次机遇是手工业向工业转化的可能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繁荣鼎盛时期，手工业作为农民的副业获得极大的发展，手工业向制造业的转化本来是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西欧近代初期的制造业就多半是从农村手工业转化而来的。但在中国，这条发展的“通路”又一次遇到集权专制官僚的阻碍。中国过去较为普遍和较为发达的盐、铁、酒、碾米、印刷等手工业，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转化为官业或官僚垄断之业。这些手工业的盈余更多的是被转用于官僚们非生产的消费，而不是变成扩展生产的资本，这是中国产业资本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官僚统治扼杀了社会孕育的一切新事物的萌芽，作为小农经济对立物的商、工、市民阶层始终未能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来自人民的反叛都是农民起义，而不是市民起义。它们都止于促成王朝的崩溃，而没有导致社会革命。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刚性特征还可以从技术传播的角度考察。科学技术是社会结构变迁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传统中国，技术往往仅是个人的技艺，是保障个人生活来源的手段。技术多是通过父子或家庭单系传授，祖传绝技或祖传秘方的说法是很普遍的，很多技术发明都因单系传授道路的阻断而被埋没。这在考古发现中已屡见不鲜。由于技术得不到广泛而快速的传播，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总结甚为困难，技术往往不能形

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下不能得到普遍的应用。可见中国系统的科学理论的难产是不能仅用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来解释的。另外，由于官僚阶级的主要兴趣并不在生产上，所以技术一经出现或公开，就首先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罗盘用于看风水，火药用来造鞭炮，外国来使送入宫内的众多机械钟表，在王公大臣的眼里都不是先进技术的凝结物和象征，而是观赏宝物和贡品。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刚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内生的和外来的新要素的固有排斥上，一切新事物都只有在不对原有社会结构形成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四 传统社会的整合性

社会结构的整合本来是相对于结构分化而言的，但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整合性具体表现为民族同化、文化融合和社会一统。

就民族而言，中国古有“五胡”、“四夷”之说，系指匈奴、鲜卑、女真、契丹等民族。在稍近的时期又有“七族四夷”之说，七族指汉、满、蒙、回、藏、苗和东部沿海居民；四夷则是指汉族之外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实是对汉族四周少数民族的蔑称。但是，众多的少数民族以汉族为地域和文化中心同化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却是事实。某些历史学家把元朝和清朝的建立称为异族的征服，实在是一种误解或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因为蒙、满实为中华之同族，而非异族。汉族之所以在民族同化中处于中心位置，是因为它是以稳固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并处于中央平原的农业民族，游牧民族虽在军事上征服了它，却无法在经济上超越自给自足的小农体系，为了统治的需要，也就不得不采用与这些基础相适应的宗法组织形式、儒家文化和道德伦理。

就思想体系上的文化而言，儒家学说的历史变化过程可概括为“以夏变夷，而非变于夷”，孔孟之道先后吸收、融合了名法、谶纬、道佛，并进而提出“中学为体”，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其中的奥秘，在于孔孟学说的一体三用：上可成为官僚统治阶级“替天行道”的理论依据，中可成为教化万民、维系社会的治国之术，下可成为修身养性的伦理手段。孔孟之道不事鬼神，不是迷信；不信奉上帝真主，不是宗教；不言万物之道以无为为本，不是玄学；不追索自然本源、“自然法”，也不是“元物理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它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体用不

二”，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哲学。正是这一特点和它的实用功能，使它能够历代统治者的维护下融合其他的和外来的思想体系，也使鼓吹它的士大夫们在不能达而“兼济天下”时，可以去避而“独善其身”。

就社会而言，它本是由无数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行动者组成的，但在“大一统”的观念指导下，七族四裔、三教九流、男女尊卑都被限制和整合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所谓“差序格局”，按费孝通的解释，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是以“己”为中心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有差等的次序”（费孝通，1985/1948：27~28）。中国古有“五伦”、“十义”之说，“五伦”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十义”指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到汉武帝时被提炼和概括为三纲五常，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从表面上看，这其中除了君臣是政治关系外，其他都是家庭伦理关系。实则不然，因为中国的特点是伦理政治，国和家是相通的，“国家”乃“国”与“家”的融合物，“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一张由亲缘关系为纽结构成的等级化庞大网络渗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毛细孔。一切社会关系似乎都有一种连带责任：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犯法，九族株连。其结果是：整体淹没了个体，道统专制扼杀了自由创造，等级体系泯灭了民主意识。

五 传统社会的二元一体性

维护社会关系的有序一般有两种手段，一是外在的法——法理，二是内在的法——伦理。二元一体指的就是法理和伦理的一体化。

人们常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礼治国家”或“人治国家”，并把“礼”等同于道德伦理，这种说法是很不确切的。中国并非有法无法。早在秦朝时，死刑的方式就有戮、弃市（弃杀于市）、腰斩、车裂、阢（活埋）、凿颠（凿顶）、抽肋、囊扑（以囊盛受刑人，扑而杀之）、枭首、夷族，此外还有徒刑、笞刑、徙边、禁锢等。这些刑法后来日臻完善，发展成中国封建时代著名的五刑：墨（即黥）、劓、剕、宫和大辟，就是脸上刺字、割鼻、断足、去势和斩。直到清光绪新政变法，才“参酌各国法律”，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可见中国并非无法，而是中国人的法律概念着重指刑法，民法和私法很不发达，民法和私法的功用多半由“礼”替代。中国的“礼”有强制性一面，甚至会“杀人”，